

风雨

历程七十年

FENGYU LICHENG QISHI NIAN

★ 龙舒林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 龙舒林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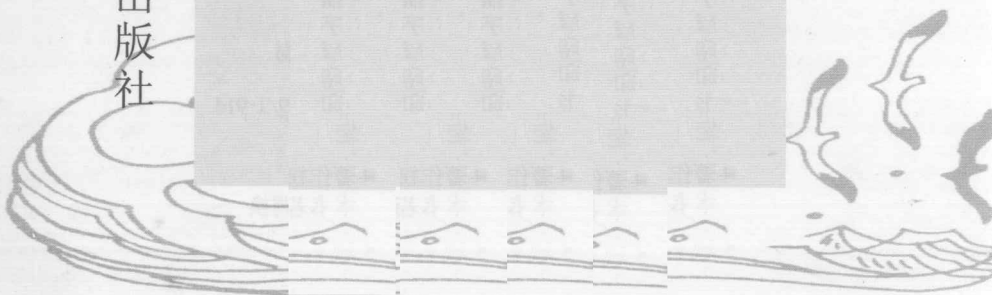
雨

历程七十

YU LICHENG QISHI

风
FENG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雨历程七十年/龙舒林著.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9

ISBN 7-220-06093-9

I. 风... II. 龙... III. 革命回忆录-中国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4671 号

FENGYULICHENGQISHINIAN

风雨历程七十年

龙舒林 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蒲其元 天涯
邱云松
古蓉
伍登富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盐道街3号)
<http://www.bookss.com>
E-mail: scrmcbsf @ mail.sc.cninfo.net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86679239

印 刷
开 本
印 张
插 页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印 数
书 号
定 价

双流县印刷一厂
850mm × 1168mm 1/32
5
4
108 千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1-1000 册
ISBN 7-220-06093-9/I·914
8.00 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1936年10月初

摄于长征途中



1940年新婚留影

1936年10月2日
机要科侦察台部分同志长征途中
在甘肃徽县合影
右起

吴达明(译电员)
谭天哲(译电员)
龙舒林(机要科长
兼侦察台政委)
孙 勇(报务员)
王永浚(研究员)



1940年调军委机要处工作时与军委二局
部分同志留影



1956 年我的大家庭



1961 年在四川省委党校



1984年在总参三部“红二方面军技术侦察工作座谈会”上。



结婚60周年留影

前言

离休后的十余年，我一直没有打算写自己的回忆录。

1932年我从地方工作调到红军工作后，长期在首长身边作机要工作，有些内容不宜写。新中国建立的初期又调地方工作，一直负责主持干部训练，都是按部就班地执行中央、省委规定的训练内容，觉得没有什么独特的东西可写。且我在四川工作的十六年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期，我参加过多项社会改革运动，其间牵涉了方方面面的风雨是非又难下笔。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的大女儿从成都来京探亲，要求把我一生的足迹留给子孙们；我的原籍湖南茶陵县各文史单位亦来函索要文稿照片等实物；战友、同事们都认为我应该写……于是我粗略地向大女儿谈了我一生的经历，并把身边所存的零星资料交给她，她夫妇两人起草写了《一

个红军战士的足迹》。我阅后认为大框框还可以，但不尽如意而搁下。1999年回延安参观受到启发，决意在原稿上重写。写写停停，停停写写，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拼凑成本文——《风雨历程七十年》初稿。初稿完成后又向十几位战友、同事征求意见后作了些修改补充，原拟自费付印若干册送给茶陵县文史单位及亲朋好友作纪念。

有同志看到此稿后，向四川省委建议，在四川省委党校建校五十周年之际正式出版，得到四川省委主要领导同志的支持。

谨向四川省委致谢、致敬！

谨向所有帮助审阅书稿的同志致谢、致敬！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家庭及少年时代	(1)
和睦的家庭	(1)
读书的岁月	(2)
卷入革命浪潮	(4)
第二章 投身革命与战争征程	(6)
参加本县共青团工作	(6)
考入红军学校	(8)
在湘赣省军区工作	(10)
参加六军团西征	(14)
湘鄂川黔边区的技术侦察工作	(17)
红二、六军团长征中的侦察工作	(20)
红二、六军团与党中央恢复联系前后	(28)
成立红军第二方面军	(31)
赴延安	(32)
在中央军委二局工作	(33)
调军委机要处工作	(37)
在中央党校一部参加整风学习	(40)

南征摘记	(46)
中原突围前后	(58)
调晋绥军区创建技术侦察处	(63)
在平绥前线	(67)
创建西北军大绥蒙分校	(70)
 第三章 由军队调地方工作	(73)
干部培训工作	(73)
创建成都革大	(73)
筹建四川省委党校	(75)
省委党校的反右派运动	(78)
两个党校合并	(81)
三年困难时期的机关生产	(84)
参加社会重大运动和工作	(84)
参加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85)
参加“三反”运动	(89)
参加农村工作	(94)
大跃进的年代	(101)
庐山会议及其反右倾运动	(107)
参加中央七千人大会	(109)
参加出国旅行团	(111)
参加农村“四清”运动	(114)
调北京工作	(117)
在北京外语学院工作	(117)
“文革”运动中的十年	(118)
调国务院外专局工作	(128)

第四章 离休杂记	(131)
迟到的故乡行	(132)
登井冈山 游韶山	(137)
复谭天哲同志的一封信	(138)
金婚聚会	(143)
为贵州瓮安乌江大桥和红军碑林公园落成题词	(145)
我的大家庭	(145)
回延安	(147)

第一章

家庭及少年时代

和睦的家庭

1914年农历正月二十三日，我降生在湖南茶陵一个农民家庭。

父亲丧偶后与江西莲花丧偶的母亲成婚，便在茶陵、莲花交界处的塘下租房定居。婚后生了我和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一家人的生计主要由同母异父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嫂嫂的辛勤耕作来维持。他们对我特别好，为了让我读好书，不让我过多地参加田间劳动，更不让我参加重劳动。我能读几年书，全赖他们的支持。所以在众多的兄弟妹中我和他们两对夫妇感情最深。新中国成立后，母亲已经去世，兄嫂中也只有两人健在。1965年春，我第一次回乡探亲时，特地到江西莲花看望他们，一见面都热泪盈眶，相互倾诉离情。我在他们家里住了两夜，重温骨肉情谊。新中国成立后，我一直在精神上、物质上给他们一些慰藉，直至他们离开人世。

父亲读过几年书，粗识文字，重视礼教，对我要求很

严。我每与同村孩子发生口角争执，回家必然受到他的严厉训斥。父母尽其所能让我多读几年书，想让我改变当农民的命运。我的第一位老教书先生常在我的父亲面前称赞我的“天资高”“领悟快”。劝他让我成为一个“读书人”。父亲尽力让我多读点书，但是禁止我读小说。他认为小说是“下本”（当时乡里人把小说称作“下本”），是一些文人胡编乱写捏造出来的淫秽故事，看多了会使人变坏。至今我还记得我借同学一本《今古奇观》看，被父亲发现，他大发脾气，硬是把书烧了。（殊不知我参加革命以后从阅读文学作品中学到了大量文化知识。）

母亲善良贤惠，勤于劳作。既料理家务，又下地干活。她没有缠过脚，在我们那个偏僻的山村里，只有有钱人家的女子为了好看才缠小脚。母亲虽然没有读过书，却豁达识礼。《增广贤文》里的东西她背得很多，如“自恨枝无叶，莫怨太阳偏”、“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这些俗语几乎成了她教诲子女的信条。我常听到她和父亲商议，想让我读几年书以后去学中医，当一个乡村“郎中”。这就是他们的最大愿望。

读书的岁月

在这个贫苦的家庭中我很幸运，在许多兄弟中就只有我上过七年学。我九岁上私塾，从《三字经》开始，第一年读完《论语》，第二年开始读《孟子》。那时的读书方法就是背诵。每天上午、下午放学前都背向老师背上几页前

面读过的书。老夫子很少讲解，他的教学法就是教你照着书读，读多了，字就认得多了，背熟了，意思就理解了。读了两年私塾后，三村联办了一所国民小学，我又进国民小学读五年级。学校开设了“算术”、“三民主义”、“社会”、“修身”、“国文”等课程。因为课本都是白话体，只有国文课本是浅显的文言文，学起来很轻松，不费力。同时还上音乐课，组织体操游戏，远足旅行等，比之读私塾时，心情愉快、视野开阔多了。当时正是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所有课本内容都是健康向上的，歌曲内容也都是进行爱国和品德教育，如“从军歌”、“节俭歌”等。但是后来国民小学由于经费拮据而停办，我又回过头来读私塾，第一年重温四书，老师讲解了一遍。第二年开始同比我长几个岁的三个同学和老师住在一起。上午代老师给初学蒙童点读《三字经》、《论语》，下午老师给我们几个大同学讲解经书，晚上读古文、唐诗，每隔十天写一篇文言作文。至今我还记得老师出的第一篇作文题目为“试各言尔志”。作文无非是抄些“诗云”、“子曰”之类的陈词套语。《诗经》、《左传》读完后因偏僻农村买不到该读的经书，老师便把他所藏的《小学集注》、《东莱博议》等给我读。但我觉得它难读难背，毫无兴趣。加之几个比我大几岁的同学多是从莲花、永新过来的，常常谈及他们那边建立红色政权的情况，一些“红色”青年也不时来到学校“参观”“交流”，学生无心再读书，老师也不管不问，私塾实际上已瘫痪。

几年私塾给我打下了文化基础，亦给我的小脑袋瓜里塞进了一些三纲五常、四维八德之类的东西，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或多或少，忽隐忽现地对我产生影响。

卷入革命浪潮

1928年，朱德、毛泽东红军会师井冈山。一年之后，江西省永新、莲花、宁冈的革命业已闹得轰轰烈烈。莲花一带是红色政权，而茶陵一带为国民党统辖。经常听到“共产党共产公妻”、“杀人放火”的恐怖宣传。我家离莲花仅一里多地，当时两方民间往来不受任何限制。离我家五里的秧堂是一处比较大的集市，每逢三、六、九赶集，莲花农民络绎不绝地挑运农产品到集市销售。离我家十里处私人开设的元陂铁厂，完全依靠莲花农民挑运猪岭坳铁矿石维持生产。茶陵这边的农民，则将本地土产品运往江西境内推销，不受任何阻拦。那边过来的学生跟我们一样，热情，讲道理，言谈举止有礼有度，相处也很融洽。这段时间内赤白两区的民间交往，土产交流十分正常。当然，怕“共产”、怕“公妻”的财主们都悄悄地溜走。所谓红区、白区的真正对立，乃是因为蒋介石对红区实行碉堡封锁后，从红区逃出去的地主豪绅组织“铲共义勇队”、“还乡团”，经常到红区抓人、杀人而造成的双方对立局面。

我在十五岁时由陈圣珠、陈泉深两个共产党员介绍秘密加入共青团，时间大约是1929年底或1930年初。当时全村只有我一个团员，故同三个共产党员一起过组织生活，他们是一个党支部还是一个小组，我始终不知道。建立红色政权后，陈圣珠当了第一届乡政府主席，他在一年以后的肃反中被误杀。陈泉深被国民党杀害，陈连官参加了中央红军，长征经过贵州时负伤被留在民间，他在当地

结婚成家，听说建国后曾回乡探亲。

1930年，茶陵县建立了红色政权，我又参加了儿童团。练队列、作宣传、站岗放哨、维持秩序、毁神像……干得热火朝天，少年气盛有点狂。莲花县那边有个城隍庙，我们村里的儿童团跑到庙里去毁神像，用大粗绳做个圈套住神像的头，大家合力拉绳子，硬将一个个神像的脑袋拉断落地，接着是一片欢呼……。20世纪90年代一个做木工的侄孙来信告诉我，乡里决定修复那座城隍庙，他任木工组长。我当即在来信上信笔写了“世事沧桑谁可料，爷毁神像孙修庙……”不久，我又接到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堂兄为修复旧庙写的两幅长联，征求我的意见。我去信称赞其长联之文采，同时也为有钱不修学校去修庙的做法感到遗憾、可惜。